

# 人口年龄结构的城乡差异分析\*

## ——基于人口红利视角

赵颖智

**摘要：**2010年我国人口红利达到巅峰，人口总抚养比降至历史最低水平。2011年人口总抚养比开始增加，传统的人口红利出现拐点。然而，在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人口结构整体变化和其内部变化并不一致，人口红利在人口分布上发生了乡城转移。通过对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中城乡人口年龄结构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地区少儿抚养比一直高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城镇地区的总抚养比远低于农村地区。导致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差异和人口红利乡城转移的原因在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城乡差别以及城镇化进程中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因此在我国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为了获取更有效的人口结构转变收益和城镇化释放的人口结构红利，应该完善就业服务体制，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参与效率，同时通过资金、机构和服务三重保障，提高农村地区社会养老水平。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红利；城乡差异

**中图分类号：**C912；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6-0138-05

人口再生产过程中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带来了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因而在不同时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同影响。David E. Bloom等(1998)在研究东亚奇迹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带来劳动力人口比重上升，形成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对经济发展有利的黄金时期，并将其称为人口红利期。<sup>①</sup>建国以来，我国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过渡，再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随着我国人口结构中少儿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力人口比重的上升，很多学者提出我国存在人口红利并且正开启人口机会窗口，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作出了较大贡献。<sup>②</sup>从1990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低于50%、人口机会视窗开启至今，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一些学者认为我国人口红利已经耗尽或者面临消失的转折点，传统人口红利给经济带来的增长作用将会下降。<sup>③</sup>这些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红利的分析是从我国人口变化的总体情况来看的，然而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表现出较大的城乡差异，人口结构整体变化和其内部变化是否一致

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探讨。

### 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

#### 1. 人口年龄结构越来越老化

按照国际常用的判断人口年龄结构的指标，我国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属于“成年型”人口年龄结构（0—14岁人口比重在30%—40%之间）。随着出生率的继续上升，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人口年龄结构变成“年轻型”（0—14岁人口比重超过40%）。之后，随着出生率的缓慢下降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少儿比重持续下降，老年比重持续上升，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回到“成年型”。从1987年开始，少儿比重下降到30%以下，人口年龄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1&ZD03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影响的机制分析与实证研究”（项目编号：31541411002）的成果。

结构进入“偏老年型”。而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进入“老年型”。2010年以后，少儿比重下降速度放缓，老年比重不断增加，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越来越老化。（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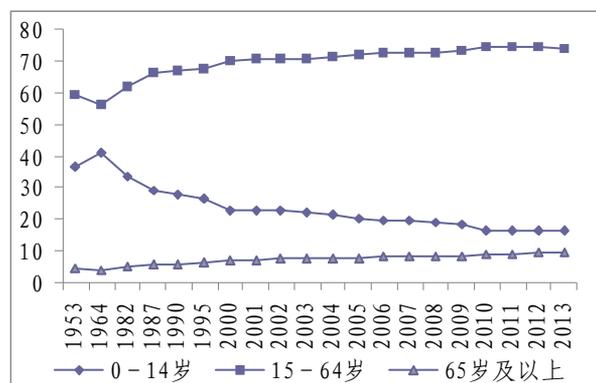


图1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 (%)

## 2. 2011年人口总抚养比开始上升

从人口抚养比的变化来看，建国初期高出生率带来高比重的少儿人口，使得总抚养负担加重。第二次人口普查后至20世纪80年代，少儿抚养比大幅下降，老年抚养比缓慢上升，总抚养比迅速降低至50%以下，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人口机会视窗开启并开始释放出人口红利。20世纪80年代以后，少儿抚养比继续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但其增幅远低于少儿抚养比的降幅，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的人口总抚养比逐渐下降。

2010年是人口红利发生变化的拐点。2010年人口红利达到巅峰，人口总抚养比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为34.2%。2011年人口总抚养比开始上升，达到34.4%，2013年人口总抚养比增至35.3%。发生这种改变的原因是，少儿人口比重从2010年开始几乎不再下降，而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老年抚养比上升的幅度开始高于少儿抚养比下降的幅度，使得人口总抚养比开始上升。（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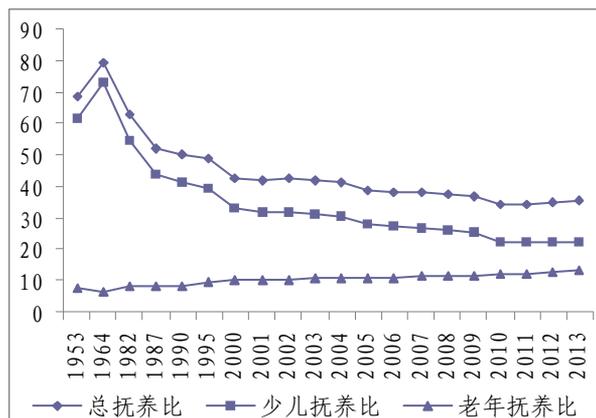


图2 我国人口抚养比的变动 (%)

## 3. 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暂未下降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由1953年的33655万增长至2013年的100582万。（见图3）从增幅来看，1953—2010年年均增长约1162万，2011—2013年增幅大量下降，年均增长仅有约150万。但总体看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并未出现下降趋势，人口红利在数量上的优势尚未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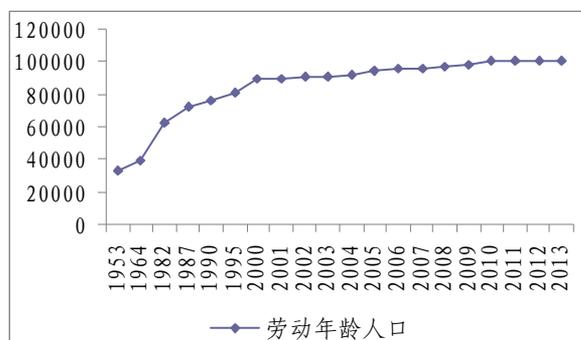


图3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变化 (万人)

因此，单从我国总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动来看，2011年因为总人口抚养比上升，出现了人口红利的拐点，可以看成是传统的人口数量红利开始下降的转折点。但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并未同步下降，人口红利并未消失。在工业化进程中，生产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劳动生产率和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同时城镇化的推进改变了人口分布结构。那么，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内部是否一致，人口红利是否在人口分布上发生了转移？考虑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较大的城乡差异，下文从人口年龄结构的城乡变化入手，比较分析全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中城乡人口年龄结构是否存在差异，其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对人口红利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 二、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城乡差异

### 1. 城镇少儿人口比重下降速度快于农村

1964年，城镇少儿人口比重（41.6%）与农村少儿人口比重（40.6%）大致相当，其后二者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开。到2010年，城镇少儿人口比重下降至14.1%，农村少儿人口比重下降至19.2%，二者相差5.1个百分点。（见图4）这个差异在少儿抚养比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城镇少儿抚养比从1964年的74.8%下降到2010年的18.1%，降幅达到75.8%；农村少儿抚养比从1964年的72.7%下降到2010年的27.1%，降幅为62.7%。（见图5）城乡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幅度大于少儿人口比重的下降幅度，与抚养比的分母即城乡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变

化有直接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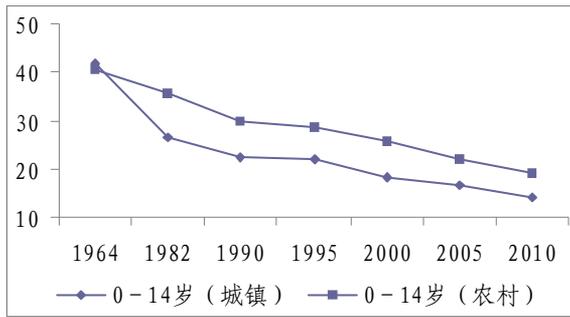


图4 城乡少儿人口结构的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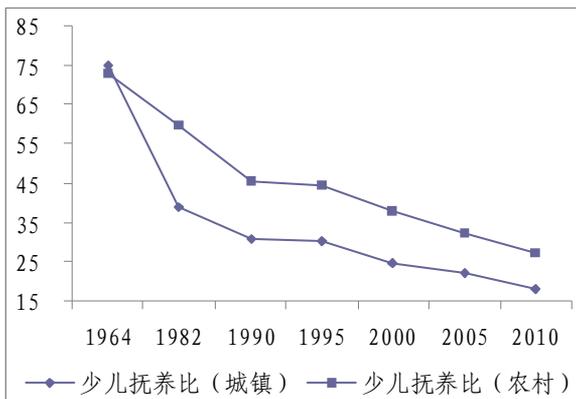


图5 城乡少儿抚养比的变动 (%)

## 2. 农村老年人口比重高于城镇

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比重一直高于城镇，人口老龄化出现了城乡倒置的现象，且二者之间的差距先缩小后逐渐拉大。1964年城镇老年人口比重为2.8%，农村老年人口比重为3.6%，二者之间的差距仅为0.8个百分点。此后城镇和农村的老年人口比重开始上升，农村先于城镇进入老龄化结构（农村在1995—2000年之间、城镇在2000—2005年之间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2010年农村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0%，而城镇为7.8%，二者之间的差距拉大到2.2个百分点。（见图6）城乡老年抚养比的变化趋势与老年人口结构相同，农村的老年抚养比一直高于城镇，其中城镇老年抚养比从1964年的5.0%上升到2010年的10%，农村老年抚养比从1964年的6.6%上升到2010年的14.1%。（见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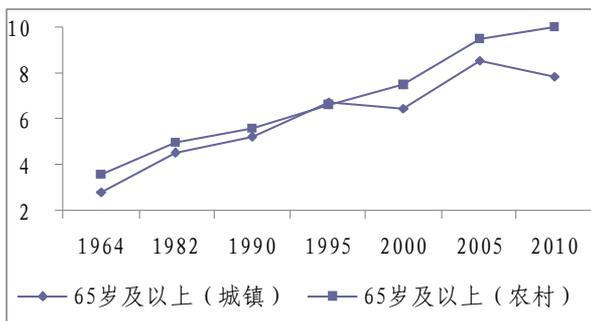


图6 城乡老年人口结构的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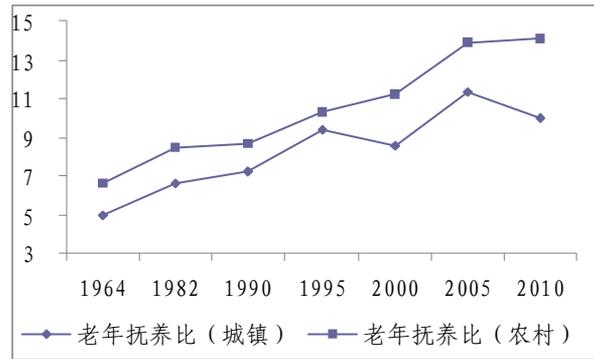


图7 城乡老年抚养比的变动 (%)

## 3. 农村人口总抚养比高于城镇

作为计算抚养比的分子——劳动人口的比重，除1964年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基本相当以外，其余年份农村地区一直低于城镇地区。城镇劳动人口比重从1964年的55.6%增加至2010年的78.1%，增幅为40.5%，农村劳动人口比重从1964年的55.8%增加至2010年的70.8%，增幅为26.9%。全国人口总抚养比在1990年低于50%，城镇人口总抚养比在1982年前已经低于50%，而农村人口总抚养比在2000年才低于50%，城镇人口机会视窗较早就已开启。（见表1）在农村少儿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比重均高于城镇的情况下，农村人口的总抚养比明显高于城镇，农村人口抚养负担较重。

表1 城乡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及人口抚养比 (%)

年份	城镇		农村		全国	
	15—64岁	总抚养比	15—64岁	总抚养比	15—64岁	总抚养比
1964	55.6	79.7	55.8	79.3	55.7	79.4
1982	68.8	45.3	59.6	67.8	61.5	62.6
1990	72.4	38.1	64.8	54.3	66.7	49.8
1995	71.5	39.9	64.6	54.8	66.6	50.2
2000	75.2	33.0	67.0	49.3	70.1	42.6
2005	74.9	33.5	68.5	46.0	72.0	38.8
2010	78.1	28.0	70.8	41.2	74.5	34.2

## 三、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城乡差异的原因分析

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城乡差异来看，城镇的人口抚养负担，不管是少儿抚养比还是老年抚养比均低于农村，从人口分布的视角来看，人口红利出现了乡城转移的现象。导致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 1. 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城乡生育率差别，但差

别在逐渐缩小

生育率的变化反映出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同时人口出生率影响到每年出生人口的数量和总人口数量，从而影响少儿人口比重和少儿抚养比。从人口出生率来看，一直以来出生人口中以农村出生人口为多数，但这一比重在逐渐下降。1990年农村出生人口数占到总出生人口数2385万的80%，2000年农村出生人口数占到总出生人口数1182万的67%，2010年比重下降到55%。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总和生育率在2.8左右，其中城镇接近1.6，农村接近3.0。其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城镇和农村的生育率开始下降，且城镇生育率下降开始的时间也比农村和全国整体早。199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2.29，接近更替水平，城镇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62。2010年城镇总和生育率仅为1.018，农村总和生育率也仅为1.438，基本达到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数量控制目标。（见表2）

表2 1990—2010年城乡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

年份	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		
	全国	城镇	农村	全国	城镇	农村
1990	79.45	55.85	88.79	2.290	1.620	2.578
2000	36.11	29.06	40.93	1.220	0.970	1.430
2010	33.31	28.31	39.04	1.181	1.018	1.438

注：数据来源于第四、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其中城镇数据为作者根据城市和镇统计数据合并计算所得，总和生育率数据为作者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所得。

总体来说，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我国的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至更替水平之下，且城乡有别的数量控制政策使得城镇出生率和生育率一直低于农村，从而使得城镇少儿抚养负担低于农村。但随着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单独二胎的逐步放开，未来可能全面放开二胎化生育政策，城乡之间出生率和少儿抚养比的差异会进一步缩小。

2. 大规模的乡城人口迁移给城镇带来红利，加速了农村老龄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实行渐进性的改革开放政策，一方面由于广大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一方面由于体制松动导致长期积累的势能开始补偿性释放，规模庞大的乡城劳动力转移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急剧爆发，成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最显著的人口现象。

陈友华（2005）认为，伴随着人口的迁移与流

动，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会在国家和地区间发生转移，人口流出地难以享受到人口红利，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后，还要比发达地区偿还更多的人口负债。<sup>⑥</sup>随着经济和城镇建设的迅速发展，我国进行乡城转移的流动人口数量日渐庞大，2000年为1.21亿，2012年达到2.36亿。根据人口普查统计资料计算，2000年流动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85.2%，2010年流动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83.2%。2010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农民工群体中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以后出生）的比重越来越大，而50岁以上的农民工比例仅为12.9%。这些数据说明，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乡城转移的流动人口主要为劳动年龄人口，农村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为城镇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人口红利发生了乡城转移。

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农村青壮年人口向城镇迁移流动，使得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农村地区老龄化程度加重。原新（2005）认为，乡城流动人口消减了城市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负面影响，增加了城市劳动力供给，延缓了城市的老龄化进程。<sup>⑦</sup>王泽强（2011）通过建立“年龄—迁移率”模型，预测说明乡城人口迁移加深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sup>⑧</sup>但是杜鹏等（2010）在研究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发现，许多国家普遍出现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的城乡倒置现象，这只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大规模城乡人口迁移基本完成，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时，这种城乡倒置状况将发生转变。<sup>⑨</sup>尽管如此，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完成人口城乡迁移、进入城镇化高级阶段仍然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2010年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达到6711万，比城镇地区多1487万，农村地区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更需要重视。

####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建国以来，随着我国人口再生产方式的逐渐转变，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经历短暂上升后开始逐渐下降，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形成了少儿人口比重下降、劳动人口比重上升、低人口抚养负担的人口红利，并开启了人口机会视窗。2011年我国总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传统的人口红利出现拐点，但并不能就此说我国的人

口红利开始消失。在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传统的人口数量红利正在面临转折，但城镇化和农业劳动力非农化带来的人口分布变化能进一步释放人口结构红利，促进第一次人口红利向第二次人口红利转变，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层面上获取更有效的人口结构转变收益。

在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城乡之间出现了较大差异，城镇的少儿抚养比和总人口抚养比一直低于农村，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情况与城镇相比更为严重。可以说，我国的人口红利发生了乡城转移，而导致人口红利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主要原因，是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城镇化进程中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中的数量控制政策会逐渐放开，对城乡间人口出生率差异的影响将会逐渐减弱，但大规模的乡城流动人口即农业转移人口对人口红利的影响仍会持续。因此，要更好地发挥出乡城转移的人口红利的作用，促进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的协调统一发展，必须提高城乡流动人口即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力效率，同时重视农村地区的养老问题。

从人口结构的总体上看，我国的劳动力总量是一定的，但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转移到非农业生产中，提高了劳动效率。为了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促进乡城流动的农业转移劳动力在城镇的就业，提高劳动力的参与率和效率，这也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第一步。在城镇就业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和生存基础，因此，充分发挥人口红利作用的第一步就是引导农民变成非农就业人员，实现职业身份的转换。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包括就业信息、政策咨询、就业服务、农业转移人口培训等的社会化就业服务体系，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关于转移成本、收益、风险等的免费咨询服务，减少盲目不合理流动造成的效率损失和经济损失。同时，要大力发展政府职业中介机构，整合市场优质职业中介机构的信息和资源，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为农业转移人口就业乐业提供最优质最适合的服务，最大限度地释放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的势能。

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迁移，将人口红利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农村地区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淡化。大多数农村家庭虽然能为老人提供基本

物质保障，实现物质赡养，但在物质保障水平和精神照顾方面存在很大欠缺。为了更好地解决农村地区老龄化问题，必须发挥农村社会养老的功能。在资金保障方面，应该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模式，提高覆盖范围和保障水平，使其更适合我国农村的实际发展情况；在机构保障方面，要加快完善农村养老机构，拓展农村社会福利院的服务功能和方式，鼓励社会主体参与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在服务保障方面，要通过建立发展农村社区，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质，减少老年人的孤独感和心理落差，解决老年人的精神赡养问题。

注释：

① David E. Bloom, Jeffrey G. Williams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8, 12(3), pp.419-455.

②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研究》2004年第2期；于学军：《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1期；田雪原：《“人口盈利”与“人口亏损”》，《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年第4期。

③ 常红：《专家：2013年中国人口红利或将消失 第二次人口红利可能再来》，《人民网》2012年8月24日。

④ 此部分关于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和抚养比的数据来源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964、1982、1990、2010年）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1995、2005年），作者根据城市、镇和农村模块分别计算得到。

⑤ 生育率为当年出生人口数与育龄妇女总人数之比，总和生育率为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子女数。

⑥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05年第6期。

⑦ 原新：《乡城流动人口对大城市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分析——以京、津、沪为例》，《人口学刊》2005年第2期。

⑧ 王泽强：《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基于“年龄—迁移率”的定量分析》，《西部论坛》2011年第11期。

⑨ 杜鹏、王武林：《论人口老龄化程度城乡差异的转变》，《人口研究》2010年第3期。

作者简介：赵颖智，女，1986年生，湖北仙桃人，经济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湖北武汉，430073。

（责任编辑 刘龙伏）